

甘惜分

文集

(第二卷)

甘惜分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资金以及心平基金会的支持



甘惜分文集

甘惜分 著

(第二卷)

人民
日报
出版社

文集
甘惜分
目录

注:

1. 首次发表的文章前标记★

2. 按照写作时间排序;少数文章写作时间不明确的,如已发表过,以刊发时间排序,如没发表过,排在当年末尾

1956年

一年来新闻摄影教学成绩的初次检阅(《摄影业务》1956年第7期) 001

1957年

“本报内部消息”是一篇反动的特写(《文艺报》1957年第34期) 003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人民日报》1957年9月6日) 009

略论王中的新闻思想(《新闻业务》1957年第9期) 013

1961年

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封信(写于1961年三四月间,后首次刊发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023

关于报纸的性质问题(提纲)(写成于1961年6~7月间,后首次刊发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032

无产阶级报纸的历史继承性问题批判的批判(提纲)(写成于1961年7月11日,后首次刊发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037

1979年

- 报纸和无产阶级专政（《光明日报通讯》1979年第6期） 044
- 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首次发表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 049
- 党报是属于人民的（首次发表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065
- ★我们报纸的作风（1979年为一个学术讲座起草的大纲，从未发表，根据作者手写稿录入） 066

1980年

- 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2期） 074
- ★党报史上的杰出文献——重读刘少奇同志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讲话（根据作者1980年3月手写稿录入，首次公开发表） 081
- 什么是新闻——关于新闻的定义（《新闻学论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9月版） 082
- 论新闻价值（刊发于《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6月版） 101
- ★新闻改革 势在必行（《旅大日报通讯》1980年第12期，本书首次公开发表） 115
- ★谈谈怎样做学问（1980年12月6日作者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讲座发言稿，首次公开发表） 118
- 论典型报道的得失（《陕西新闻研究》1981年第1期） 123
- ★再论典型报道的得失（写于1980年底，本书首次公开发表） 127

1981年

- 论新闻工作者的追求（《新闻与写作》1981年第1期） 132
- 新的时代 新的论争（《新闻学论集》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 137
- 论新闻学（《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158
- 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1981年7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的发言稿，刊发于《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6月版） 169
- 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新闻学论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192

1982年

- ★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讨论提纲）（写于1982年春节，首次公开发表） 202
- 关于报刊史研究方法的一封信（《新闻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3期） 206

★坚持原则 立志改革（1982年10月29日发言，首次公开发表）	210
★报刊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造舆论（1982年6月24日至26发言稿，首次公开发表）	221

1983年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序（《新闻学论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	230
关于新闻工作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对话（写于1983年5月，《新闻学论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	241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83年7月22日报告，首发于《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6月版）	251
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3年9月3日会议发言，《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6月版）	267

1984年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写于1984年，《新闻学论集》第17期，北京出版社1998年9月版）	276
★论党委同党的新闻事业的关系（写于1984年10月，首次公开发表）	305
★在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84年11月2日在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致辞，首次公开发表）	313
新闻工作者的自豪感（《新闻记者》1984年第12期）	326
提高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水平（1984年12月25日发言，《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2期）	330
怎样自学新闻理论（《解放军报通讯》1984年第3期）	333

1985年

★办好学会的关键在于办好新闻学刊（《新闻学会通讯》1985年第2期，首次公开发表）	337
为《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答读者问（《新闻知识》1985年第4~5期）	339
当前我国新闻刊授教育的形势（《新闻业务》1985年第7期）	356
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新闻学论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359
论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11期）	382
战火中的神笔（1985年论文，刊发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384
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航标（《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12期）	391

1986年

- ★要疏导，不要堵截——从“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的宣传看舆论的威力
（写于1986年1月13日，首次公开发表） 395
- 论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写作》1986年第2期） 400
- 谈新闻与宣传（写于1986年3月，发于《新闻学论集》（第11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 405
- 新闻学与历史学（1985年9月发言稿，后发表于《新闻学刊》1986年第2期） 415
- 两个十年 两个时代 十大变化（《新闻战线》1986年第10期） 428
- 历史机缘识广播（《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1986年版） 433

1987年

- “多声一向”论——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初稿写成于1987年5月8日，
《新闻记者》1989年第6期） 437
- 舆论与社会进步（《百科知识》1987年第6期） 449
-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1987年12月10日《新闻理论与实践》
和《新闻学会通讯》1988第1—2期） 454
- 怀韬奋，“抓头尾”（《中国记者》1987年第8期） 460
- ★新闻工作者要严格要求自己（1987年发言稿） 463

1988年

- 发挥新闻工作的优势（《新时期新闻业务讲座》，军事译文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72
- 精神产品不能提倡商品化（《新闻界》1988年第1期） 482
- 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年第1期） 487
- 关于在报纸上宣传新闻改革与新闻工作的倡议（李普等，《中国记者》
1988年第3期） 490
- 重温主席谈话，改进报纸作风（《山西发展导报》1988年3月22日） 492
- 说真话——新闻改革的第一步（《解放日报》1988年4月10日） 496
- 新闻改革的忧和求（《新闻出版报》1988年4月13日） 498
- 广播电视，姓甚名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年第5期） 500
- ★我国新闻学研究概述（写于1988年，首次公开发表） 502
- ★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此文写于1988年，
部分刊发于《新闻学论集》，第14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 505
- ★中国新闻界必须痛改“左”病（写于1988年，首次公开发表） 542

1989年

论“窗口”(《新闻界》1989年第2期)	552
论舆论引导(《新闻世界》1989年第2期)	555
舆论监督和多种声音(《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3期)	558
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读《基础舆论学》(《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3期)	561
希望在青年一代——寄语新闻战线上的初学写作者(《新闻与成才》1989年第4期)	563
此中甘苦有谁知——读《人民日报回忆录》(写成于1989年3月,后首次发表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566
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回忆(《新闻业务》1989年10月)	572

1990年

★重温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新闻思想(1990年4月23日发言,首次公开发表)	584
悲喜交集的回忆——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写于1990年11月,《新闻业务》1991年第1期)	590
★新闻定义——一场有趣的思考(1990年手文稿,首次公开发表)	597

1991年

战火中的高级研究班(刊发于长路、李素编《贺龙育才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版)	606
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1991年4月29日讲稿)	612

1992年

传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写成于1992年4月12日)	626
让中国了解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1992年10月发言稿,《新闻大学》1993年第1期)	633
烽火中的晋绥十年(《山西文史资料》1992年第5辑)	636
★为21世纪培训新闻人才——在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的发言(1992年11月,首次公开发表)	657

1993年

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视点》1993年第2期)	660
★市场经济下中国新闻界的走向(1993年发言稿,首次公开发表)	666

为人民办报——牢记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新闻研究资料》总第6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669

《新闻学大辞典》的编纂构思（写于1993年11月，《新闻界》1994年第1期） 672

我的一点解释——关于重庆《大公报》（写于1993年12月18日，
《重庆报史资料》1994年4月） 675

1994年

尊重事实是记者的准则（原刊发于《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1期，第20页） 677

警惕“党八股”卷土重来（北京《学习》杂志1994年） 678

1995年

21世纪向我们走来（华中理工大学《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5年第1期） 680

爱国主义——海外华文报纸的重大主题（《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
总第27期《'95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82

1996年

美国新闻业的新动向（《青年记者》1996年第2期） 688

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新闻界》1996年第2期） 689

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体制课题总结报告（写成于1996年4月16日） 695

1997年

静观大陆外传媒谈香港回归（《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 704

1998年

新闻与历史（《新闻爱好者》1998年第8期） 711

★中国新闻体制的由来和现状（写于1998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表） 714

2000年

领导人和记者（《新闻界》2000年第3期） 727

2001年

延安《解放日报》的遗产（《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 729

2002年

现代传媒应该是人民的朋友和向导（香港《时代传媒》2002年第7期） 736

2004年

这个老头何所思（写于2004年6月，后收入《甘惜分自选集》） 740

2006年

多读好书勤思索——与新闻专业学生谈怎样学习（《新闻战线》2006年第1期） 756

2011年

★我的新闻思想的要点——回答读者的提问（这是作者2011年10月1日~2日
专门为文集出版而新写的文章） 759

1956年

一年来新闻摄影教学成绩的初次检阅^①

新闻记者手中应该有两件武器：一是写字的笔；一是摄影机。二者的运用有别，但其作用基本相同，即迅速地、准确地、真实地记录事件和评价事件。

担负着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这一重任的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不仅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习分析事件的正确方法，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锻炼他们的道德品质和意志，而且必须使他们掌握从事业务的技能，其中包括摄影的理论和应用。

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1955年才把摄影作为加修课安排到教学计划中去。报名加修的学生很多，学校受器材和指导教师的限制，只批准了二十五个加修学生，其中二十三人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照相机的。

一年的工夫，就可看出成绩来了，这次展览就是成绩的初次检阅。展出照片共六十二幅。这些照片的生活触角伸展得相当广，举凡教学活动、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国际情谊、体育锻炼、园林风光，从校内到校外，从躲堂到厨房，从教授到学生，从工人到儿童，从饲鸭人到牧象者，都在视野之内，并且照片表现得活泼清新，看不到受已经形成的照片表现公式化、老一套的影响的痕迹。可以说，初学者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一个正确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许多作品的取材颇为新颖。例如洪钟哲摄的“热爱中国儿童的阿拉伯母亲”这一幅，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妇女来校访问，一般的摄影者可能只会注意他们与校长座谈，或校园散步，而洪钟哲却选取了她们和孩子逗趣的一刹那。你只要看到那两位慈祥的外国妇女怎样撅着嘴以逗引怀抱中的孩子发笑，你就不能不佩服这位摄影者抓取镜头的本领了。这张照片所显示的国际主义的友谊和母亲的爱，比普通所见者胜过许多。这张照片的缺点是儿童面部太偏后，看不清儿童的脸孔；其次是曝光嫌弱，色调略为灰暗。

^①编者注：原刊发于《摄影业务》1956年第7期，第45～50页。原文配发有相关照片，本书收录时略去。

北京大学拥有一所美丽的校园，未名湖畔常令游人流连忘返，而一般的摄影爱好者都以湖光塔影作为北大校园的表征。现在我们所见的“黄昏”

（王瑞兴摄）却大异其趣，当夕阳西照，作者大胆地运用了逆光，使近处的人物和远处的树林都在天空的云霞和荡漾的湖水衬托下成了黑影，人物头发的飞动和湖水漾起的波澜尤其使观众有风的感觉。”这幅照片使我们享受了自然的美。

邢克忠摄的“别害怕，溜一会就好了”，在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方面是比较好的。有一位外国作家说过：一个人在泥泞中走路，他会感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愉快，如果用摄影把这人照下来，就只剩一个溅满一身泥浆的人。这就是说，摄影是比较难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但是邢克忠的这张照片，不知别人以为怎样，我却感到那位初学滑冰的女孩子的内心的紧张和愉快。她右手紧紧握住指导者的手，头下低看着难于移动的脚步，为了防止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的跌跤，她左手张开随时准备撑在冰上。她很窘，然而她很兴奋。我们见过许多滑冰照片，都表现纯熟的滑冰技巧，但很少见过把初学滑冰的窘态拍摄下来，“万事开头难”，这张照片的寓意在此。

郭超人摄的“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夫人来我校讲学受到同学欢迎”，这是群众性的场面，如果以普通视平线拍摄，只能看到前面几个人，显不出欢迎客人的盛况，因此他选择了较高的拍摄点，视平线升高，使欢迎的群众充满了整个画面，甚至使人感到溢出画面之外。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心人物居中偏左，周围群众的视线全部集中在主体人物身上，因而主题非常鲜明。运用光线也很好，不但人的面部都清晰可见，并且每个人的头发和肩上都都被太阳光描出了白色的轮廓，增加了照片的美感。

此外的许多作品，各有优点，当然也各有其不足之处。一般的缺点是画面平板，有的是视线居中，缺乏变化；有的构图零乱，中心不突出；有的取了不适当的人群或物体作背景，以致损伤了画面的统一和完整。此外，还有个普遍的缺点是底片都保存得不好，从放大照片上可以看到划伤和斑痕，这必须在今后多加注意。当然，有些照片的光线运用还不够好，感光也不十分准确，因而画面不够明朗和柔和，层次也不多。这一方面是技巧还不熟练，另一方面也由于技术设备不足，不能在必要时候用人造光来补充光线的不足。但我以为初学者不应过分依赖技术设备，而应当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许英杰和高新华合作的“游国恩教授在科学研究”，就是克服技术设备困难的例子。这张在室内拍摄人像，就是完全应用来自窗外的自然光线。

最后，我们应该祝贺已经获致的初步成绩，并预祝在北大新闻学教研室和新华社摄影部合作下，培植出更多的摄影人才来，使他们在未来的新闻战线上充分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武器，以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

1957年

“本报内部消息”是一篇反动的特写^①**疯狂的反党分子**

到底是谁阻碍了生活前进？刘宾雁回答说：是党、是党的领导。刘宾雁在他的特写里散布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腐朽了，上下都黑漆一团了，党的领导过时了，不适于新形势了，党不能代表人民了。世界要变，党要改造，暴风雨到了。

那么到底谁是生活的革新者呢？刘宾雁回答说：是我，是我所塑造的人物黄佳英，那是我的影子、你们认识吗？我反对政治冷淡，反对热情衰退，反对官僚主义和随波逐流。我高举着革新者的大旗，一切反党的青年万岁！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万岁！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所谓青年作家刘宾雁在他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散布的全部思想内容。尽管刘宾雁隐蔽他的反党面目，但实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1956年，刘宾雁突然成了中国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红人”，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刘宾雁的名字一时成了憧憬的对象。刘宾雁仅仅写了两篇特写，以揭露我们生活的所谓阴暗面而大出风头。

现在查明刘宾雁的反党活动是由来已久的，他的特写是他的反党活动的一部分。“在桥梁工地上”的反党思想还只是露了一点苗头，那是刘宾雁对我们文学界的趣味的试探，当他发现他的观点颇有市场的时候，他的反党思想就不再是零售，而是批发，在“本报内部消息”中卷起了一阵反党的狂风暴雨。当然，刘宾雁是新闻工作者，他了解知识分子和报纸编辑部到底比了解桥梁工地内行得多，因此他的后一篇特写比前一篇对党的攻击也就刻毒得多了。

刘宾雁打击的矛头是针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报纸，他的特写的标题就是具

^①编者注：原刊发于《文艺报》1957年第34期，后收入《在“写真实”的幌子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77～86页。

有煽惑性的：“本报内部消息”，意思就是党报编辑部的幕后新闻。刘宾雁有时用污蔑性的特写，有时通过他的主人公的对话到内心独白，有时直截地用作者的插话，对党的报纸肆意攻击，他像新闻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说党报不受群众欢迎，有着一张令人生厌的嘴脸，其原因就在于党性，就在于党的领导，就在于报纸编辑部执行了党的指示。刘宾雁所梦想的就是报纸摆脱党的领导，不是党领导报纸，而是报纸领导党，记者和党处于平等地位，一枝笔可以横扫天下。实行了刘宾雁的纲领，我国的报纸会达到怎样可悲的命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近来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批判新闻界右派的文章，本文在这方面拟从略。

刘宾雁笔下的共产党员形象

刘宾雁的特写是文艺作品，他虽然借题发了不少可耻的议论，但他主要地还是描写了省级党报“新光日报”编辑部的一群工作人员，描写了一群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刘宾雁企图以刻画这些人们的灵魂来宣传反党思想。

刘宾雁在他的特写里不只一次地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是怎样的人”这样一个尖锐的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在刘宾雁的笔下，党报编辑部的共产党员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概括起来就是：现在的新闻工作干部是一群既无才又无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道唯唯诺诺，盲目服从上级指示，而一点也不考虑群众意见；不独立思考，毫无创造性的庸碌之辈。总编辑陈立栋就是一个表面上恭谨勤劳实际上一脑袋个人打算、贪图名位、大权独揽、排斥异己、上谄下骗、喜欢奉承、不懂文化、摧残人性的角色。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能长期占据总编辑这个要职呢？刘宾雁暗示说：第一是因为老资格、革命二十年的老干部；第二是因为对上级百依百顺，政治上可靠。这就是刘宾雁所描写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

不但对领导干部如此，刘宾雁用了很少几行描写了一个“中年的人”，抵毁她满足现状，讨厌对我们生活的批评，而她却是“报社里女同志中间拿薪水最多、休养时期最长的一个。以为这样一笔就把老干部骂倒了。另一个入党也不短的党员——总编室主任马文元，也是陈立栋型的人，他后来“转变”了，是由于反党分子的推动，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的。至于新党员，不过是一些人格卑鄙的投机分子，在爱情上也玩弄手腕，为了爱情出卖组织（张野），或者是饱食终日，满足现状，专拿别人开心的庸俗不堪的女人（钱家娴）。

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按照刘宾雁描绘，陈立栋、马文元等人，在入党以前也曾经是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青年，而一旦参加了党，提拔到了什么什么“级”，这些人的灵魂就开始腐化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名位而变成谨

小慎微、只以上级的意见为意见，毫无独创性的保守分子了。刘宾雁把党说成是腐蚀人类灵魂的陷阱。

刘宾雁描写共产党员都“不过是一个不好也不坏，不积极也不消极，不进步也不落后”的人，他说这些人也许是过得去的局长、科长、厂长、编辑，都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日子”。刘宾雁把经常充满着新鲜事物的报纸编辑部酿成是“走进编辑室，就会有一种昏睡沉沉的感觉”。刘宾雁甚至干脆把共产党员描绘成套子里的人，就像契诃夫对旧俄知识分子所描写的那样，刘宾雁写道：“是的，这几年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他（马文元——引者）为自己造了一只四四方方、厚厚实实的箱子，把自己装了进去。这箱子隔音、防潮，也不怕震动，可它同时也把阳光给隔在后面了。”这个箱子的比方显然是有着双关意义的。

用黄佳英来改造共产党吗？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质不止如此。如果刘宾雁只是把我们的生活描写成一团漆黑，把共产党员当一群饭桶，要是只是这样，刘宾雁不过是一个居心不良的诽谤者而已。不，刘宾雁所追求的不只是诽谤我们。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改造我们，用他的理想来改造世界。

本来，文艺作品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题材，自然也可以写讽刺性、揭露性的题材，问题在于作者是从什么立场上来讽刺、来揭露。在我们这个社会条件之下，人民的作家对我们社会的缺点怀着和人民同样的情感，怀着战胜它、克服它的决心，那么，这样的作品，即使没有正面人物出场，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热情的脉搏的跳动，也可以触摸到作者崇高的情感，也可以认识作者自己。但是刘宾雁为了标示自己的理想，他为了给他所丑化的一群共产党员们作个鲜明的对照，他为了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来教训我们和改造我们，于是他给我们抬出了一个所谓“正面人物”，送来了一个黄佳英。

黄佳英这个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的女青年团员，在刘宾雁的笔下不但外表很美——身材修长，白皙的面孔上一双特别黑的眼睛，一切都匀称而端正，有时诙谐，有时沉思，惹人喜欢——而且她的心灵多么纯洁，刘宾雁赋予这个人物多么高贵的品质啊！简直是新时代的苔丝德蒙娜。她工作积极热情、昼夜勤劳；当一切工作部门不关心人，而叫人毁灭的时候，黄佳英却对人十分关怀，她关心那些开会过多而睡眠不足的工人，她为工作安排欠妥的工人寻找工作，她为一个不相识的、儿女过多的贫苦妇女作经济上的接济。她走在生活的最前面，正直而勇敢，敢于和任何人作斗争，当她的爱人卑鄙地以拉她入党为条件来博取她的爱情时，她断然拒绝了这种爱情，总之，黄

佳英是刘宾雁理想中的美人。

不但如此，黄佳英甚至感动了、争取了和改造了老共产党马文元。马文元解放后在党的机关工作，冷淡了，消沉了，才能和人性都毁灭了，每天早晨抱着孩子晒太阳混日子。他学会了三条规律：“阶级立场”、“人生观”、“思想作风”，靠这个他就能两年升一级，一直向上爬。总之，这是个陈立栋型的灵魂濒于死灭的人。但是救星来了，1955年冬天，他“跟着”黄佳英到了工厂，看到了生气蓬勃的生活，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马文元又累、又怕泥泞，不愿再走了，可是黄佳英说服了他，这个穿了一件老长的有些绊脚的雨衣的姑娘身段那么灵巧，不断跨过泥坑和滑溜的山坡，还不断说着笑话，感染了害怕困难的马文元。从此以后，马文元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他像她一样思考，他对过去的一切都发生了怀疑，对党发生怀疑，隐隐约约地踏上了反党的边缘。

但是我们透过刘宾雁这些过于美化的玫瑰色的描写，就会发现黄佳英这个形象的实质。刘宾雁把她当作正面人物，捧为英雄，而在我们看来，这个人物是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黄佳英的形象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形象，是反党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刘宾雁显然把黄佳英看成今天的齐天大圣，要她来大闹这所社会主义的天宫。你看，她利用工人对开会过多的不满（刘宾雁是用一万倍的放大镜来观察我们生活中的臭虫的）鼓动工人罢会，她把一个对工作不满的工人带到报纸编辑部来以使用他去向党和政府请愿，她把党的报纸鄙薄得一钱不值，她在党的会议上放肆地攻击党，她拼命地吹嘘自己，使自己膨胀得无限大。看起来，党没有资格领导她，只能由她来领导党。而对这一切，刘宾雁都是寄以极大的同情和衷心的喜悦来歌颂的，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共产党员们都快死灭了，只有黄佳英和黄佳英型的人活着。

听到有人说过：“黄佳英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勇敢有为的青年的文学形象，她还幼稚，但青年谁不幼稚呢？似乎不能武断地抹煞。”可是黄佳英和我们通常所鼓励的独创性和勇敢行为有什么相干呢？独创性、勇敢，如果和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联系起来，那就是极可贵的品质；而如果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会培养成极其可怕的极其危险的性格，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性格。至于青年的幼稚，自然可以经过教育和锻炼而逐渐改正的。但是黄佳英这个形象仅仅是思想幼稚的问题吗？她是刘宾雁自己的影子，也是林希翎、谭天荣一类反动青年的化身。刘宾雁丝毫没有批判黄佳英，而是怀着爱情来塑造这个形象，这就充分反映了刘宾雁的反动美学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无政府主义的臭气

我们说“本报内部消息”散发出无政府主义的臭气，还可以指出许多例证。刘宾雁要求“根本改变一套制度、一套习惯”，他首先攻击国家的人事制度，“为什么越是做人事工作的人，却常常最少考虑人的事情呢？”刘宾雁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反对由国家分配工作人员，而提倡人们自己选择工作。大家知道，我国现在分配工作人员的原则是个人志愿和国家需要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执行中间，发生个别分配不当的缺点，是可以改进也正在改进的，但刘宾雁要求的却是另一种原则——绝对依从个人志趣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在全篇特写中，刘宾雁把独立思考吹嘘得多么美妙啊！他把独立思考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其实独立思考也是有阶级性的，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独立思考，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就能思考出新鲜的、丰富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而去“独立”思考，结果只能动摇到资产阶级思想阵地上去。历史的规律是这样：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独立思考，就是前进了一步；摆脱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而“独立”思考，就是历史的倒退。刘宾雁企图打倒一切权威，实际上他是要打倒共产党的权威，而树立自己的思想权威。何况打倒一切权威的思想也是典型的无政府式的，恩格斯早在1872年就嘲笑过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傻子。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只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承认船长的权威，在狂风大浪里拒绝服从一个人的意志，那么这只船和乘客们的命运是可知的。

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它排斥任何集中的领导、任何国家政权、任何组织和纪律，排斥集体主义，而鼓励发展个人主义，提倡绝对的自由，无限地发展个性。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①曾这样明白地宣传他们的纲领：“这个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的社会——引者）鼓励个人的发展，而对于一切倾向于‘统一’与‘中央集权’的趋势，则加以排斥。”^②他甚至宣传“任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这简直是疯狂的个人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面前发出来的呓语。用镜子照一照吧，刘宾雁的特写所宣传的思想，不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狂言呓语吗？

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间横贯着整整的一条鸿沟，……

~ ~

^①编者注：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父亲是俄国世袭亲王，却抛弃了贵族继承权，故被人称为“无政府王子”。

^②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开明书店1939年版，第450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宇宙观只是翻了面的资产阶级宇宙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①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无政府主义阴魂不散，它经常附着在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身上，如刘宾雁就是。

刘宾雁和奥维奇金

刘宾雁是自诩为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学生，甚至以“中国的奥维奇金”自居。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以其热情地反映现实生活，受到苏联文学界的极大注意。但是企图模仿奥维奇金的刘宾雁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对奥维奇金是没有研究的，不可能评价奥维奇金特写的文学价值，但也不难发现刘宾雁从奥维奇金那儿只偷窃了某些观察生活的技巧，奥维奇金那种炽热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对刘宾雁始终是一团不可接触的熊熊大火。

奥维奇金说：

我们有些同志，费很多时间去进行空洞的没有意思的争论，比如说一个作品应该有多少写正面人物，多少写反面的？加入在作品中写人物，应该有多少个正面人物，多少个反面人物；光明与黑暗在作品中的比重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把作品写得又真实，又不至于诽谤我们自己的社会？这种争论是一种无谓的争论，毫无实际意义。假如我们是从党的立场、党的愿望出发，为了帮助生活前进而写的话，为了从我们生活里消灭、赶走一些坏事，帮助把好事肯定和巩固下来而写作的话，那么好坏的分量，光明与黑暗的分量，自然而然地会安排得很恰当。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不要违背和脱离党的声音；不要违背党的号召和党的愿望^②。

你看，“从党的立场党的愿望出发”、“不要违背和脱离党的声音”，奥维奇金谆谆告诫人们使文学成为党的文学，具有党性的文学。而刘宾雁偏偏丢掉了这个“党”字；这决非偶然的疏忽。无政府主义者怎能和党性相容呢？奇怪的是奥维奇金来中国的报告一直是刘宾雁担任口译的，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受到教育。

还是这位奥维奇金，1955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农业主题文学会议

^① 《列宁文集》第2册，第100页，人民出版社。

^② 1945年10月奥维奇金参加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对中国新闻工作者所作的“特写——文学的战斗体裁”的报告记录。加粗显示是引用者加的。